

新四军历史事件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明生

由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与河南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召开的“新四军历史事件研究学术讨论会”4月17日至19日在洛阳市举行。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学者及新四军老战士8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44篇。会议对新四军历史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皖南事变

一些论文和发言讨论了共产国际、苏联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和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这两个问题。

1、关于共产国际、苏联对皖南事变的态度。有的论文认为：苏联为了确保东部边界的安全，全力应付德国，决定加强中苏关系，大力支持和援助国民党蒋介石抗日，以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这虽然对中国的抗日是一种支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并成为皖南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皖南事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主张息事宁人，深恐引起全面内战，危及苏联的自身安全和中国的抗战。因此，他们在对蒋介石进行质问和谴责的同时，要求中共对蒋介石让步，以退让求团结。但中共中央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采纳了共产国际意见中正确的部分，确定了在政治上采取猛烈的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策略，维持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2.关于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是会议讨论中的一个热点。

有的观点认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是他在皖南三年时期内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总暴露。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失败，是项英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项英片面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在统一战线方面只强调联合，而忽视斗争。有的文章认为：项英在皖南的错误既有受王明影响的一面，又有他个人的原因。如项英的南进战略设想，前期是由于对形势估计失误，后期是对统一战线丧失信心，准备到国民党后方去打游击。

有的观点则认为：项英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惨重损失应负主要责任。他率部滞留皖南，多次丧失了北移或东进的有利时机；在会攻星潭问题上否决叶挺不惜重大牺牲攻占星潭，杀出重围的主张，决定将部队撤回丕岭以西；在部队面临被围歼的重要关头，私自离队。但如把皖南事变损失的全部责任推给项英一人是不公正的，中央和叶挺也有失误。如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对时局的估计就有失误，低估了曹甸战役的影响，把撤退皖南部队作为汤恩伯、覃连芳20万大军停止向苏北进攻的交换条件等。叶挺的失误则表现在他“不懂游击战争”，“只会打阵地战”，“未能跨越北伐战争经验”，部署了石井坑守备战等。

二、关于路西反顽斗争

路西反顽斗争是指1941年2月至5月，新四军第四师在豫皖苏边区进行的三个月的反顽斗争。这场斗争，就其规模、复杂性、残酷性而言，在当时的华中乃至全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是新四军第四师和豫皖苏边区斗争史上的一次严重挫折，其结果使新四军第四师损失了4000多人，丢失了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数以千计的抗日群众和地方干部惨遭逮捕和屠杀。对此事件如何评价，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会上，也就此事件进行了争鸣。

有的观点坚持认为：路西反顽失败是皖南事变的继续，作为

四师主要领导人彭雪枫应负主要责任。在开辟豫皖苏边区的过程中，他与华中局在战略发展方向上有分歧，没有切实执行中央与华中局东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也有原则性错误，最终导致了四师反顽斗争的失败。依据是1942年3月15日，华中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磨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

有的观点则认为，华中局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磨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在主要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以偏概全，无限上纲，对整个反顽斗争和彭雪枫本人作了不客观、不公正的评价。并认为：1.彭雪枫自1938年2月奉中央和周恩来之命赴豫工作，同年10月率部挺进豫东敌后，至1941年5月奉命转移津浦路东，都坚定地执行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及军部的指示，其战略发展方向是正确的；2.在反磨擦自卫战争中，彭雪枫率领四师和豫皖苏边区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华中局和军部向西发展的方针，并以1万7千人的兵力与14万2千余人的反共大军进行了三个月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成绩是巨大的。新四军虽遭受部分损失，并奉命转移津浦路东，但却从战略上沉重打击了反共军的进攻，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赋予的“坚持豫皖苏边区阵地，抵抗反共军进攻，不让其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的战斗任务，保证了路东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3.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发展武装、创建根据地、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争取敌伪军工作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应当充分肯定。

有的观点则认为，路西反顽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主观上表现为政权建设不巩固，群众组织发动不足，党对地方土顽和已改编过来的地方武装的政策有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顽军没有区别对待，打了马彪和何柱国等。在客观上，当时四师处于华中前卫，在皖南事变后，全党全军都有为皖南死难烈士复仇的急躁心理。因此，当日军借顽我矛盾骤然发动豫南战役时，很多人都认

为这是打退国民党反共磨擦战争的良好时机，把四师推向孤军反顽自卫战斗的前沿，以至主力冒然“西进”，插足顽区，形成顽我对峙，刺激了顽军，改变了战争态势，加剧了顽我矛盾，并被日军所利用。四师主要领导人彭雪枫在路西反顽斗争中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应对路西反顽斗争的失利负有责任，但他在豫皖苏边区开辟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应予肯定，在战略发展方向上，也基本和中央及华中局是一致的。

三、关于汤团行动

1943年4月16日，正当日伪对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清乡”时，苏中人民抗日武装，通海自卫团在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鼎立（又名沈仲彝）的率领下，全团接受汪伪改编。到1943年9月29日，这支部队又在汤景延等人的率领下，从汪伪内部破腹而出，在驻地十几个据点同时暴动成功，重新回到了根据地，史称这次行动为“汤团行动”。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次行动，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1943年10月，苏中区党委敌工部调查报告中认为：“汤团自1943年4月15日穿起伪军装，到1943年9月29日出来，前后共计167天，以634个人员和枪械钻到敌人心脏里去，做了一趟冒险的活动”，“这种斗争方式，已超过了一般敌伪军工作范围以外，它是以革命的武装为活动基础的，用伪装的反戈投敌去取得敌伪的信任，用反革命的面目，参加‘清乡’的姿态，配合反‘清乡’斗争，这样就使得这次斗争，带着浓厚的间谍斗争性质，但它又是与一般的间谍斗争不同的，它是以武装为其活动的资本，环绕着武装问题，造成了事情的全部发展过程。而汤团内部的干部和战士，因为政治觉悟的高低不等，参加这次斗争，也有自觉与落后的分别，再加上斗争的对手是奸刁狡猾的敌人，这样就造成了这次斗争全部过程中的困难、复杂和危险。”

1944年苏中整风时，有的同志提出不同观点，批评汤团行动

是“机会主义”，是“冒险”。文革期间，汤团行动则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典型。

这次会上有的观点认为，汤团干部、战士深入虎穴，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值得赞扬，但汤团行动在当时造成了根据地人民思想的混乱，影响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反对日伪“清乡”的士气，为日伪的反共宣传提供了口实，与国民党的“曲线救国”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行动本身应予否定。

有的观点则认为：“汤团”异乎寻常的行动，是从战略的高度，为保卫整个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所作的正确决策，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殊行动。与“机会主义”、“曲线救国”风马牛不相及，是革命策略的灵活运用。汤团行动的结果是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原建制和驻防地，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前沿保持了一块缓冲地带，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苏中人民的坚持抗日，同时还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为苏中反“清乡”斗争，秘密输送出了大批军用物资，并在日伪“清乡”的关键时刻，从日伪内部破腹而出，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为苏中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应予以肯定。

四、关于天目山战役及其它

1945年2月至6月间，南下的新四军的苏浙军区部队与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双方，在浙江西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重大战斗，新四军损失3056人，国民党军队损失1.26万人，史称“天目山战役”。

当时，新四军在浙西为什么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此次战役有何意义？史学界还存在较大分歧。会上多数人认为：在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前，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就已觊觎南下部队，并扬言“要争取第二个皖南事变的胜利”，“再打一个茂林，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因此，新四军所进行的天目山战役是站在

自卫立场上的一次正义的反击战，避免了第二个皖南事变悲剧的重演。有的认为，天目山战役是国民党顽固派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蓄谋发动的全面内战的一次预演，新四军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强大顽军主力部队的经验，树立了我军可以打败国民党正规军、王牌军的信心，为粉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作好了思想上、战略上与战术上的准备，同时还保证了中共中央发展东南战略任务的完成，加强了江南抗日力量，遏制了日寇对大后方的进攻，粉碎了顽军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消灭江南新四军的阴谋，打开了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打通了与浙东根据地的联系，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控制了天目山地区，包围震慑了京沪杭等大中城市的日寇，为迎接盟军沿海登陆，对日大反攻作好了战略准备。

此外，会议期间，与会者还不拘形式地就竹沟事件、汤沟事件、鄂东事件、鄂南事件、方钩事件、白茅山事件、赤石暴动、平江惨案、项家山惨案、特三旅问题等交流了看法和进行座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治学系）